

中共閩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

1927-1931

陳 耀 煌

摘 要

1930年12月初，中共閩粵贛蘇區代表大會決議開除上杭黨員傅柏翠的黨籍。隔年初，閩粵贛特委派兵圍攻傅柏翠的家鄉上杭蛟洋，並宣布傅是反革命「社會民主黨」的頭目，蛟洋是社黨的大本營，一連串以整肅社黨分子為名義的血腥肅反隨之展開。此即所謂的「肅社黨事件」。究竟肅社黨事件何以會爆發？而傅柏翠又是什麼人呢？儘管我們不能否認當時中共中央路線與鄧發等少數蘇區領導者的因素，然而，肅社黨事件實際上是長期以來，閩西蘇區內部各種衝突積累的結果。這些衝突可能肇因於外來幹部與土著幹部間的不合，或蘇區領導為加強對下層控制所引起之反抗，甚至可能是來自於黨員間私人意氣之爭等諸多因素。本文將以傅柏翠為中心，描述1931年以前閩西蘇區發展的概況，並從中探尋肅社黨事件背後複雜且深遠的因素。

關鍵詞：閩西蘇區、閩粵贛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事件（肅社黨事件）、中國共產黨、傅柏翠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ior Purges of CCP's Minxi Soviet Regime, 1927-1931

Yao-huang Chen^{*}

Abstract

In December 1930, the CCP's Minyuegan special committee resolved to expel Fu Bor-tsuey (傅柏翠) from party. At the beginning of following year, the Minyuegan special committee dispatched army to besiege Fu's hometown in Shanghung County and declared Fu a leader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Following this, a series of purges broke out. This is what we called the purging of Social Democrats. Why did this accident happen and who was Fu? Despite we can't deny the influence of CCP's central line at that time and some leadership of Minxi soviet regime like Deng Fa (鄧發), this accident was actually the accumulative result of various conflictions inside Minxi soviet regime from the beginning. These conflictions could derive from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outside and local cadres or originate in the resistance from the lower strata to the intensive controlling of the upper leaders, even could come from personal prejudices between party members and so on. This article will take Fu as the focus and explore the complex and deep factors of this accident from the history of Minxi soviet regime before 1931.

Key words: the Minxi Soviet Regime, the Minyuegan Soviet Regime, the Purging of Social Democrat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 Bor-tsuey

^{*} Candidate PH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中共閩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

1927-1931^{*}

陳耀煌^{**}

壹、前言

1930年12月初，中共閩粵贛蘇區代表大會決議開除上杭黨員傅柏翠的黨籍。隔年初，中共閩粵贛特委派兵圍攻傅柏翠的家鄉上杭蛟洋，並宣布傅是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社黨）的頭目，蛟洋是社黨的大本營，一連串以整肅社黨分子為名義的血腥肅反隨之展開。此即所謂的「肅社黨事件」。雖然此一事件目前已確定是一件冤錯假案，¹但我們仍不僅要問：究竟肅社黨事件為何會爆發？而被指為社黨頭目的傅柏翠又是什麼人呢？

由於目前關於肅社黨事件的學術論著，仍不多見，因此我們不難從中整理出學界關於此一事件爆發因素的兩種主要觀點。首先，史家們咸認為，當時閩粵贛特委書記鄧發之「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以及屈服於鄧發意志的張鼎丞等部分蘇區領導的個人因素，對於該事件的爆發，責無旁貸。²至於另一位閩西蘇區專家蔣伯英教授則更進一步指出，1930年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是此一事件爆發的最初根源，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貫徹，加劇了其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後果。³

^{*} 本文撰寫及修改期間，承蒙陳永發教授與《國史館學術集刊》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¹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89。

²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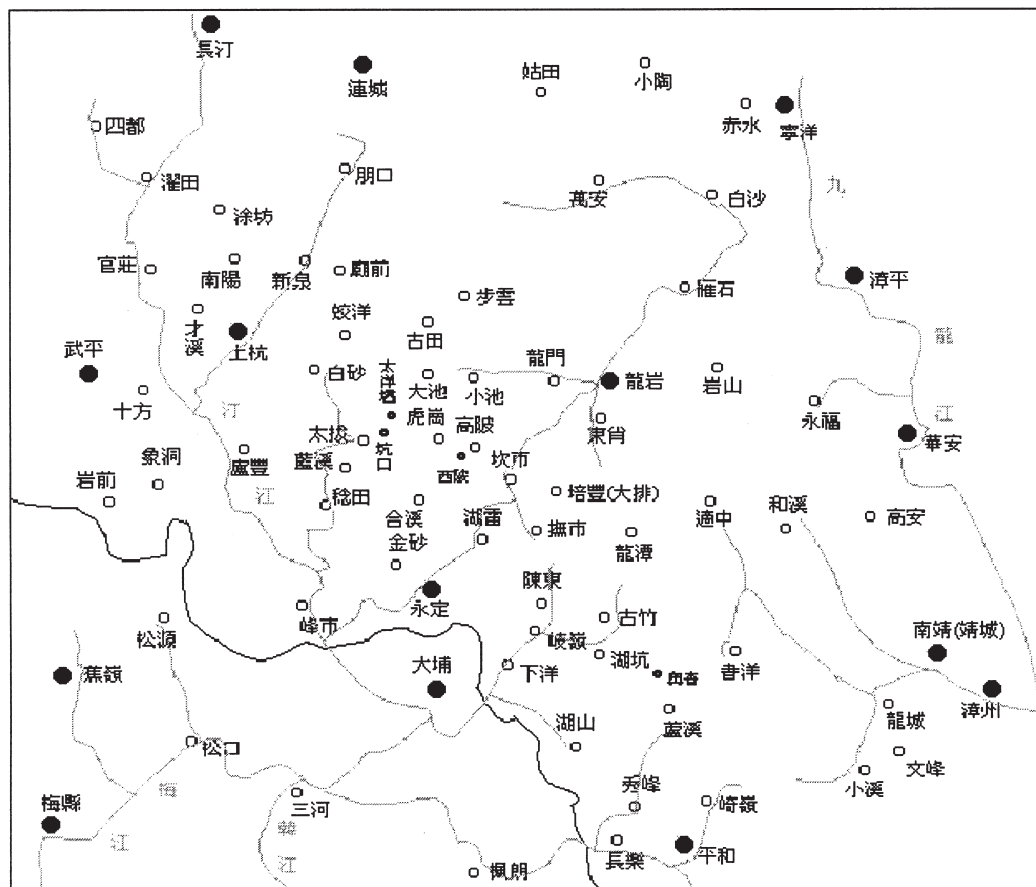
³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6。

確實，從當時的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鄧發的個人性格，或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傾錯誤，皆是導致肅社黨事件爆發及擴大的重要因素。然而，這些說法仍未能完全解答我們的疑惑。蓋根據這些觀點，肅社黨事件成了一件根源於少數個人領導以及上層路線的「突發事件」，閩西根據地過去的發展雖然與此一事件的爆發不無關聯，但並不重要。然而，果真如此，為何閩粵贛特委要選擇傅柏翠（及其他受害者）作為社黨分子的樣板，而不是其他人？是隨機取樣？私人意氣之爭？還是有其他歷史因素？

事實上，正如其他學者在研究同一時期贛南及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時所指出，這些肅反背後的因素是相當複雜的，不僅與當時中共中央的路線及蘇區的少數領導者（毛澤東、張國燾）有極密切的關聯，甚至還可以追溯至長期以來根據地內部黨員間的衝突、蘇維埃政權對地方的深入所造成的紛爭等諸多長遠的因素。⁴當然，這並非是說某些黨員早年的言行注定了其日後將遭到整肅的命運；然而，我們卻不能不說，大多數肅反事件的爆發，絕不僅僅是根源於上層路線及少數領導者性格的「突發事件」而已。

同樣的，我們如要了解閩西蘇區肅社黨事件的來龍去脈，便不能僅將焦點集中在上層路線及少數中心人物，還必須進一步去探究自閩西蘇區創建以來，至1931年該事件爆發之間，地方社經環境的作用及長期以來黨員與黨員、黨員與群眾間的互動。然而，由於主觀與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不可能詳細論及1931年以前閩西蘇區各方面的情形。因此，本文將以閩西蘇區早期的重要領導者之一，日後被指為社黨領袖的傅柏翠作為中心，描述1931年以前閩西蘇區發展的概況，特別著重於其中與日後肅社黨事件有關的重要人事物，藉此來重新探究肅社黨事件背後複雜且深遠的因素。

⁴ Stephen C. Averill, "The Origins of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p. 79-115;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頁376-414。



閩西地區圖

貳、傅柏翠與1928年以前的閩西蘇區

傅柏翠（1896-1993），福建上杭縣北路第四區（以下簡稱北四區）⁵蛟洋人，是早期中共閩西蘇區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據中共黨內文件的記載，傅是蛟

⁵ 路、區是民國時期上杭縣縣級以下的行政區劃，在蛟洋周圍分別是東邊的北五區古田，南邊的北二區白砂，以及西邊的北一區城郊。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8。

洋地區的「大地主」出身；⁶此外，傅在以「地主兼士紳資格投降無產階級」前，還是一位三民主義的信徒。⁷1914年，傅赴日本就讀東京政法大學，與同為福建籍同學蕭其章（武平人）、余子雍（永春人）諸人參與了孫中山在日本所成立的中華革命黨。⁸又，傅在日本留學時，曾接觸了不少社會主義的書籍，因此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傅日後與中共黨員接近並加入中共，與其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當不無關係。⁹

1917年，傅柏翠自日本畢業回國，在上杭縣辦起了律師事務所，為鄉里「仗義直言」，在民眾間頌聲大起。¹⁰傅的家鄉蛟洋位於上杭、永定、龍巖三縣邊界山區，易守難攻，與外界聯繫不易，係日後閩西蘇區主要的中心赤區之一。另外，蛟洋乃一純傅姓客家村，¹¹傅本人便是該族的頭面人物之一。地主、士紳的菁英地位，加上仗義直言的行動，使傅立即在蛟洋農民中贏得威望，「農民敬之如父母」，¹²儼然成為蛟洋地區的土皇帝。

正當傅柏翠在其家鄉積極活動時，中共在閩西的組織活動亦如火如荼地進行。早期中共在閩西的發展，與來自廣東大埔縣的客家人羅明（原名羅善培）關係頗為密切。羅早年由於貧困的緣故，在族人的支持下前往免收學費的廈門集美師範就讀。他自1924年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接觸後，便開始在集美師範

⁶ 〈向省委報告（濱字第五號）〉（1928/07/26），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頁77。下文中所引用的《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18冊，分別簡稱為FJWJ:1-18。

⁷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FJWJ:3，頁136。

⁸ 武平縣志編纂委員會：《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頁804-805；盧秀啟：〈九十老翁重入黨—記傅柏翠的坎坷道路〉，《人物》，1990年第2期，頁116。

⁹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臺中：撰者，1973年），頁81。

¹⁰ 盧秀啟：〈九十老翁重入黨—記傅柏翠的坎坷道路〉，頁116。

¹¹ 傅柒生：〈閩西傅氏源流考（上）〉，《臺灣源流》，第22期（2002年夏），頁4。傅柏翠日後亦指出：「傅氏一族聚居於此（按：即蛟洋）。」參閱：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福建文史資料》，第7輯（1985），頁31。

¹²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FJWJ:3，頁137。

吸收黨團員。¹³不少來自閩西的青年學子皆在羅的介紹下加入共青團或中共，日後並成為閩西蘇區的重要領導幹部，如來自永定的陳正、盧肇西，及來自龍巖的謝漢秋等，其中與傅柏翠有關係者則有來自上杭的藍為仁諸人。¹⁴吸收這些知識分子對日後中共深入閩西地區頗為重要，蓋當時福建農村，由於宗族及地方心態等因素，排外性頗強，「外來人如何能入農村，尤其是外省人，平空地實在無法可以入去」，「只有發展青年學生，由他們去入農村，或是由他們介紹得到農民同志入農村」。¹⁵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知識分子黨員，有不少是如同傅柏翠般，是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成員。¹⁶藉由他們的關係、地位及財富，中共得以迅速地動員與組織農民為其所用。然而，這類組織動員活動，並非奠基於廣大的群眾基礎，如北伐時閩西諸縣的農協，有不少便是藉國民黨的名義來委任「家長」成立，因此，數量雖多，但多流於形式。¹⁷在上杭蛟洋，農協也「成立了十多鄉，入會會員不下兩千戶，農民群眾實數達五千以上」，但這些群眾皆是出於對傅個人的信仰才起來的，是「傅同志的群眾」。¹⁸傅本人後來也不諱言地說，蛟洋鄉農會「執行委員由幾個房族頭子充當」。¹⁹

除了群眾動員外，早期的中共黨員也是透過其私人關係來從事統戰活動。

¹³ 黃奕明：〈羅明〉，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8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53-354；大埔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大埔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649-650。

¹⁴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福建黨史資料》，第3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頁1-2。

¹⁵ 〈福建工作中的問題及意見〉（1928/06），*FJWJ*:2，頁297。

¹⁶ 地方菁英（local elites）在這裡是指「在地方上（縣以下之層次）行使支配權力的個人或家庭」。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0.

¹⁷ 關於北伐時期中共在閩西地區的農運，請參閱：陳耀煌：〈菁英與群眾：北伐前後閩西地區的國共合作與農民暴動〉，《新史學》，14卷1期（2003年3月），頁97-142。

¹⁸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的概況報告〉（1928/07/29），*FJWJ*:3，頁137。

¹⁹ 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2。

這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蓋日後被指為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的江董琴（永定高頭鄉人，曾參與同盟會活動，是福建國民黨要人），在北伐時期便與閩西共產黨員有著良好的關係。據羅明所言，北伐時期中共閩南特委（1927年1月成立於漳州）所以能夠派黨員謝秉瓊（武平人）、林心堯（永定人）諸人擔任汀屬政治監察署專員，並進一步奪取閩西永定、上杭等縣的國民黨黨部，皆是依賴國民黨東路軍總政治部主任江董琴的關係。²⁰

北伐時期掌握上杭縣國民黨黨政機關的共產黨員謝秉瓊諸人，也利用黨員的私人關係拉攏武平土匪出身的地方駐軍藍玉田部²¹及地方上的「左派」分子與其合作，傅柏翠便是其中一人。如1927年3月23日於上杭縣城所成立的汀屬八縣社會運動人員養成所，便是由傅柏翠、謝秉瓊等人籌辦成立，其中傅還擔任該所總務主任。²²因此，雖然當時傅還不是中共黨員，但在部分保守分子看來，傅也是中共的同路人，故上杭國民黨縣黨部在1927年5月7日開始清黨後，除逮捕並處死中共黨員林心堯及國民黨「左派」張楷（上杭人）等人外，還「挨家挨戶搜捕傅柏翠」。²³不久後，傅便又回到他的家鄉蛟洋了。

當此之際，中共閩南特委書記羅明亦正在上杭。羅是由於4月12日廈門清黨事件，不得不離開閩南前往閩西地區活動。據羅後來所言，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傅柏翠的名字，但並未與其有進一步的接觸。8月初，中共中央特派員陳明召集羅明諸人於漳州召開會議，改組閩南特委為閩南臨時特委（書記陳明）。

²⁰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2、8-9。

²¹ 藍姓乃閩西畬族（閩西地區的原住民）的大姓，當時中共是利用黨員謝秉瓊的同鄉關係及藍維仁的同姓關係來拉攏藍部的。據傅柏翠的回憶：「藍（玉田）的地位原由閩西一些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幫他造成的。」陳耀煌：〈菁英與群眾：北伐前後閩西地區的國共合作與農民暴動〉，頁115；傅柏翠：〈土地革命初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4。

²² 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閩西革命根據地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頁24。

²³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13。據傅日後所言，當時國民黨黨部搜捕他，與「仇家構陷」有關。〈傅柏翠反正後表明心跡之一函〉，《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7月9日。

不久後，羅又前往閩西地區。²⁴這一次，他結識了傅柏翠，並在9月間南昌暴動軍路過閩西時介紹傅加入共產黨。

與傅柏翠入黨有密切關係者，除羅明外，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陳祖康。據傅後來所言：「我本來是反對這個黨（按：指共產黨），不贊成這個黨的，因為陳祖康與羅（按：指羅明）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介紹我，我不得不順點情面。」²⁵陳祖康，漳平縣城人，是早期中共福建黨的重要領導者之一，1928年6月叛變，日後被中共指為福建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物之一。1927年9月，擔任中共閩南臨時特委宣傳部長兼軍委書記的陳祖康，偕永定黨員盧冠卿赴永定、上杭、龍巖交界的永定太平里（坎市、高陂一帶）巡視，並吸收了林梅汀、簡祥明等人入黨。²⁶太平里鄰近上杭蛟洋，因此，可以推測，當時陳曾與傅柏翠碰面，並與羅明一同介紹他加入共黨。

傅柏翠入黨的情形，再度凸顯了黨員之私人關係在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然而，黨員的私人關係一方面雖有助於黨組織的活動與發展，另一方面卻可能成為阻礙。蓋當時中共在福建大多數地區並不具穩固的群眾基礎，上級的指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獲得實踐，完全視知識分子出身的地方幹部之主觀因素而定（所謂「個人即黨」或英雄式的領導）。²⁷而根據日後的事實證明，這些下層幹部大多是不甚穩固的！

當時傅柏翠的行為便使中共福建臨時省委（1927年12月成立，以下簡稱省臨委）相當憂心。一方面，雖然傅在國共分裂後遭到國民黨福建當局通緝，不

²⁴ 〈中共閩南臨時特委報告〉（1927/10/10），*FJWJ*:2，頁10；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頁13-14。

²⁵ 〈中共閩南臨時特委報告〉（1927/10/10），*FJWJ*:8，頁10。

²⁶ 陳祖康：〈青燈夜雨憶前塵（一）〉，《中外雜誌》，20卷1期（民國65年7月），頁60-66；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257；中共永定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永定人民革命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5-46。

²⁷ 日後中共福建省臨委便指出，過去的黨「只是落在一二個領袖同志（多是知識份子）身上」，「群眾的信仰、黨的工作都建築在知識份子個人身上，形成個人即黨的惡劣現象」。〈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擴大會議文件—組織問題決議案〉（1928/07/03），*FJWJ*:3，頁11。

過，大約在1928年初獨立第四師張貞回閩南駐防後，傅又重新建立起與國民黨的密切聯繫。從中共當時的文件中，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張貞是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分子（被中共斥為「第三黨」—即社會民主黨），加上地方心態的因素（張為閩南詔安人，該部多閩南人出身），因此，該部吸收了不少閩西與閩南地區的「左派」分子。²⁸事實上，先前提及的江董琴、謝秉瓊諸人，與張貞皆有密切的關係。又，在北伐時期，共產國際曾試圖就福建軍人許卓然、宋淵源、張貞三人中挑出一人予以培養，當時周恩來、陳祖康皆主張培養張貞。²⁹由此看來，國共分裂前張貞與共產黨也有不錯的關係。因此，在張貞於1928年初回閩南駐防後，中共福建省臨委便相當擔心下層黨員會倒戈投靠張貞。蓋中共福建省臨委相當清楚，當時福建黨員中，如同傅柏翠般，由於私人關係的緣故，或被國民黨認定是「左派」激進分子而遭到通緝等因素，才加入共產黨者，並不在少數。一旦這些人倒戈，對中共在福建黨務的打擊，恐怕難以估計。

不幸的是，中共福建省臨委的擔心一一實現了。如漳浦、漳州黨便因為陳祖康（叛變時任中共福建省臨委代理書記）、張余生（又名張覺覺）於1928年6月的叛變而塌台；原本便無甚基礎的閩西武平黨，也因為謝秉瓊的脫黨而停頓，蓋武平黨原初就是依賴謝的私人關係來發展，黨員與謝非親即故。³⁰這些事件充分證明了，當時大多數黨員仍未完全切斷與國民黨的聯繫（並非出於上

²⁸ 關於張貞在閩南地區的影響力，據中共福建省臨委所言：「他們（按：指閩南的張貞與閩北的楊樹莊）的部隊多是本地人，他們在本地有舊的關係，所以他們在福建的統治力量比較外來軍隊難於破壞。」地方群眾甚至視張貞及其部下楊逢年、陳啟芳等人為英雄、救世主。〈目前政治狀況及黨的工作方針〉（1928/02），*FJWJ*:2，頁121-122、133。

²⁹ 陳祖康：〈怒潮澎湃話黃埔〉，《中外雜誌》，20卷3期（民國65年9月），頁37。

³⁰ 〈趙亦松關於漳浦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6）、〈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雲和給元光的信〉（1928/08/20），*FJWJ*:3，頁113-116、121-124、168；〈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FJWJ*:8，頁11。

層「白皮紅心」指示，當時根本無所謂「白皮紅心」）。³¹據說傅柏翠此時也與謝秉瓊保持著密切往來，這使福建省臨委頗為擔心，蓋當時中共在上杭除北四區還可靠傅個人的魅力來動員農民外，在其餘地區是無甚基礎的。³²

有鑒於大多數地方黨部是掌握在少數知識分子出身的菁英黨員之手中，當時中共福建黨內便有人主張藉暴動的方式，把這些不可靠的地方幹部「推上山去」！³³後來傅柏翠所以發動蛟洋暴動，便可說是被「推上山去」的。³⁴

在國共分裂後，傅柏翠回到北四區進行組織農會、軍隊，甚至自治政府的活動。³⁵當時上杭駐軍藍玉田由於未獲得南京政府正式編制，因此心懷不滿，仍舊與地方共產黨員合作；對於傅在北四區的活動，亦未加干涉。³⁶1927年底，駐防泉州的新編第二師郭鳳鳴（上杭土匪出身）部為十一軍蔡廷鍇所逐，乃率部回閩西，驅逐藍玉田部，占上杭為己有。郭在占領上杭後，得知了北四區的情形，大為不滿，要傅立即解散農會。當時中共上杭縣委書記郭慕亮及縣委宣傳部長鄧子恢皆前來北四區活動，要傅立即進行暴動。然而，傅既不理會郭鳳鳴的命令，也拒絕了中共暴動的指示。傅所以反對暴動，一方面是出於策略上的考量，同時也是由於他顧慮群眾之安危。蓋作為一位群眾領袖，傅不可能置群眾的安危於不顧。因此，傅儘可能的避免蛟洋地區因色彩過濃而引起駐軍的注意，屢次辭退上杭縣委派到北四區的工作人員，說「他那裡的工作已做

³¹ 〈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擴大會議文件—組織問題決議案〉（1928/07/03），*FJWJ*:3，頁12。

³² 根據中共福建省臨委所言，當時上杭「因各種關係，尚未改組，他們的工作就是慢慢做去，也沒有什麼鬥爭」，因此派郭慕亮前往主持。〈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緊急擴大會議綜合報告〉（1928/01/28），*FJWJ*:2，頁78。

³³ 如閩北建甌黨便有這類想法。福建省臨委雖然反對，但亦承認福建的下級黨部，仍多「由知識份子主持，態度常遊移不定」。〈目前政治狀況及黨的工作方針〉（1928/02），*FJWJ*:2，頁132。

³⁴ 在蛟洋暴動前後，中共亦於龍巖、平和、永定等地發動了幾場暴動。關於這些暴動經過，筆者在其他地方已有詳細論述，由於篇幅所限，茲不贅述。參閱：陳耀煌：〈菁英與群眾：北伐前後閩西地區的國共合作與農民暴動〉。

³⁵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頁82。

³⁶ 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4。

得好了，不要再來人，你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趕快做起來」等語。³⁷而福建省臨委也批評傅由於顧慮私人利益，以及對黨觀念薄弱的緣故，「不敢去領導群眾擴大鬥爭，反而去制止群眾鬥爭」等。³⁸

無論如何，傅柏翠並不打算進行暴動。不過，一件偶然的事件，卻成為蛟洋暴動爆發的導火線。大約在1928年5月間，一位郭鳳鳴部的連長欲前往龍巖大小池劫掠，路過蛟洋時，該部士兵搶走了農民數隻耕牛。農民群集圍剿該部，繳了四五枝槍，並逮捕了連長。該連長與傅有關係，是傅派往郭部工作的。傅最初打算替該連長說情，不過，由於群情激憤，傅只得聽任群眾槍斃該連長及士兵。事後，郭鳳鳴威脅蛟洋農民償還二十枝槍，農民大憤，要與之決戰。郭派其副官前往交涉，農民聚眾達千人圍之，該副官不發一言即逃。³⁹後郭部鍾銘清團前往圍剿，但傅並不願意與其發生衝突，在兩軍對壘時，傅仍不斷解釋說：「我們不是共產黨，不過是實行土地革命，你們不要誤會。」⁴⁰然而，事態至此，已無可挽回。鍾團與連城民團羅其藻部迅即打垮了蛟洋農民的烏合之眾，攻入蛟洋，燒殺搶掠。從此，「傅柏翠與郭鳳鳴成了仇讎」。⁴¹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國共分裂前後，共產黨員與群眾的入黨與參與暴動，並不全然是由於政治覺悟或上層指示的緣故。如傅柏翠的入黨，與羅明、陳祖康等人的私人關係及國民黨的迫害便不無關係。其入黨後的言行，也不完全是上層路線的反映。對於傅這樣一位地方色彩濃厚的黨員來說，革命的實現不應以地方群眾的利益為代價。一旦兩者有相衝突之處，他可能會為護衛群眾利益，而不惜抗拒上層之指示。似此類曖昧的言行，無疑為日後傅被打為社黨分子埋下了因子。而傅與陳祖康等叛黨分子的曖昧關係，在肅社黨事件時

³⁷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FJWJ:8，頁9。

³⁸ 〈向省委報告（濱字五號）〉（1928/07/26），FJWJ:3，頁77。

³⁹ 〈趙亦松關於上杭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FJWJ:3，頁138；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5。

⁴⁰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上杭、武平、長汀情況報告〉（1928/07/26），FJWJ:8，頁10。

⁴¹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頁82。

期，也成了傳反革命的罪證。據日後中共黨內宣傳文件宣稱，社會民主黨的傳入閩西，正是陳祖康及張余生等叛黨分子利用其私人關係拉攏閩西黨內的動搖分子所致。⁴²此類指控，從中共福建黨早期的發展看來，並非完全向壁虛造。

叁、地方黨員間的性格差異與衝突

當然，並非所有的地方黨員在面對上層指示時，皆會採取如傅柏翠般的態度。不同的出身、性格、所處環境，甚至私人意氣之爭等，皆影響了地方黨員的行為抉擇。在本節中，筆者將透過日後捲入肅社黨事件的傅柏翠、林梅汀、林一株及張鼎丞等幾位地方黨員早期言行之比較，來闡明上述命題。

蛟洋暴動失敗後，傅柏翠率領蛟洋部分群眾與上杭縣委書記郭慕亮等人，退往上杭、龍巖交界的郭車、蘇家坡一帶山區。當時恰巧永定溪南里、金豐里⁴³在張鼎丞等人領導下爆發暴動（6月底至7月初，旋即失敗），因此，郭慕亮要求傅率領群眾到溪南里活動。但由於強烈的地方觀念，傅不願遠離蛟洋，故拒絕了郭的要求，而選擇前往離蛟洋較近的太平里一帶活動。⁴⁴民國初年的太平里及其接鄰地區，由於經濟窮困等因素，早已成為土匪世界，「土匪擄人勒索成為常事，往往僅有數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⁴⁵當時太平里的領導人，有日後因捲入肅社黨事件而著名的林梅汀與林一株，前者是該事件的被害者，後者則是迫害者。這些黨員與傅柏翠相同，也不贊同共產黨式激烈的鬥爭，並「常常替反動派虛張聲勢，發出種種怪論，很有取消鬥爭的傾向」；

⁴²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紅旗週報》，第25期，法務部調查局共黨研究中心典藏資料（以下簡稱調查局資料）：052.1/809/15497 N.25。

⁴³ 民初的永定縣，承襲了有清時期的行政區劃，全縣分為五里，分別是：城郊、金砂、西溪一帶的溪南里；下洋、古竹、湖坑一帶的金豐里；湖雷、撫市一帶的豐田里；坎市、高陂、虎崗一帶的太平里；豐稔、合溪一帶的勝運里。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頁46-47。

⁴⁴ 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7。

⁴⁵ 〈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報告〉（1928/04/03），*FJWJ*:2，頁198。

⁴⁶又，其中部分人（如林梅汀）亦是國共分裂後由陳祖康吸收入黨（參見前節），他們視陳為英雄，甚至說要他們工作「只有靠陳子侃（按：即陳祖康）的信」。⁴⁷

在傅柏翠率領蛟洋部隊來到太平里以前，他與該地黨員已有聯繫。根據傅日後的回憶，在1928年3、4月間，中共上層便指派林一株到蛟洋從事政治與軍事教育的活動。⁴⁸傅所以在蛟洋暴動失敗後選擇前往太平里活動，與林一株當不無關係。順便一提的是，當代大陸史家多視林一株為肅社黨事件的罪魁禍首之一，批評他是一位「地主出身、品質惡劣的投機份子」。⁴⁹而根據後面的論述，我們得知，林一株還是一位土匪頭子。由此推測，林一株等太平里黨員應是當時中共文件中所謂普遍於永定與連城一帶、藉氏族關係結成地方性極強的土匪團體，並且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土匪頭子。⁵⁰

當此之時，負有組織閩西特委任務之省委特派員王海萍亦抵達太平里。從後來閩西蘇區的發展來看，王海萍是一位極忠實於上層指示的行動派人物。他在福建黨內已「整肅」了不少與羅明有密切關係的人物。⁵¹可以推測，傅柏翠

⁴⁶ 〈向省委報告（濱字五號）〉（1928/07/26），FJWJ:3，頁73。

⁴⁷ 〈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報告〉（1928/07/29），FJWJ:3，頁121。

⁴⁸ 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2。

⁴⁹ 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1。

⁵⁰ 〈趙亦松關於福建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1928/07/29），FJWJ:3，頁90-91。

⁵¹ 王海萍，曾化名盧哇利，海南海口人。1925年入黨，1927年秋赴福建工作，後成為中共福建黨的重要領導幹部，1932年在廈門被捕處死。陳立明等編：《中共蘇區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56。

當時中共福建黨文件中屢次出現趙亦松這個名字。根據趙亦松的報告，他在永定暴動前後前往閩西地區巡視，還曾到太平里與傅柏翠面談，據此判斷，趙亦松與王海萍實際上是同一人。關於此點，我們還可以從閩西籍黨員溫崇淵的報告獲得證實。據溫所言，趙亦松並非福建籍黨員，他對閩西籍黨員特別不滿，特別是那些與羅明有密切關係者（如邱泮林等）。此外，趙還與由羅秋天所領導的永定縣委鬧意氣，因此屢次試圖調郭慕亮來代替羅秋天。這位郭慕亮，後來便是在由王海萍所主持的閩西特委成立會上被選為閩西特委書記的。〈溫崇淵給羅明的信〉（1928/07/20）、〈溫崇淵給中央的報告〉（1928/07/29），FJWJ:18，頁23-26、34-42。

作為羅明的好友，同樣也遭到王海萍無情的攻擊。至於那些「很有取消鬥爭的傾向」的太平里知識分子兼土匪頭子的黨員，王海萍也頗不客氣。在抵達太平里後，王海萍便制定了太平里暴動計畫，要太平里黨員立即暴動，「畏縮猶疑腐化份子須滾開」！⁵²就這樣，太平里暴動便於7月間「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參與太平里暴動的成員，有來自上杭北四區的蛟洋農民武裝，及龍巖後田暴動（1928年3月）失敗後退往太平里的隊伍，⁵³還有太平里周圍地區毫無紀律可言的土匪隊伍。事實上，據王海萍所言，「當地黨員還沒有一點鬥爭的準備」。⁵⁴傅柏翠的消極當然不用說，太平里黨員林梅汀等人也不太願意暴動。據後來肅社黨事件的審判，當時林梅汀曾對群眾說：「我們的房子，我們的祖宗是搬不開的，鬥爭失敗了，是不堪設想的呵！」⁵⁵當然，這類說法可能是後來蘇區領導為肅反而編造出來的誇大說詞，但並不見得完全是無中生有。蓋作為一位群眾領袖，林梅汀等人不可能完全置地方群眾之安危於不顧。前面曾提到發出怪論阻止暴動的太平里黨員，大概就是指林梅汀等人。

無論如何，暴動勢在必行。暴動首先由林梅汀的家鄉孔夫村展開，後試圖攻打龍巖縣城遭到挫折，隊伍乃回師攻打坎市，仍是失敗。據傅柏翠所言，由林一株所領導的文溪隊伍是少數熱衷於暴動者，蓋該隊伍原是一支土匪武裝，在暴動過程中，只顧劫掠，因此，暴動的失敗，與該隊伍的無紀律極有關係。

56

至於當時王海萍對福建黨中「羅明派」的攻擊，主要是圍繞在陳祖康、張余生事件上，指責羅明過去吸收黨員，多憑私人感情，因此造成福建黨內私人感情超過組織紀律的情事時常發生，而第三黨的混入福建黨內，亦是由此而生。由此看來，王海萍對「羅明派」的攻擊，其來有自。〈趙亦松關於福建省委緊急和擴大兩次會議情況的報告〉（1928/07/25）、〈趙亦松關於澄碼漳州（龍溪）工作概況的報告〉（1928/07/29），*FJWJ*:3，頁28-29、121-123。

⁵² 〈永定太平里秋收暴動計劃〉（1928/07/19），*FJWJ*:8，頁3。

⁵³ 當時中共龍巖縣委為避免駐軍鎮壓，也已遷至永定培豐。〈趙亦松關於武平龍巖工作概況〉（1928/07/29），*FJWJ*:3，頁143。

⁵⁴ 〈向省委的報告（濱字第五號）〉（1928/07/26），*FJWJ*:3，頁71。

⁵⁵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

⁵⁶ 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9-12。

暴動失敗後，暴動隊伍紛紛作鳥獸散，如永定太平里黨員在暴動失敗後「多離散」。⁵⁷而龍巖縣黨員，由於駐軍陳國輝的圍剿，除郭滴人等少數人外，皆逃往南洋或外地了。直到11月福建省委（1928年8月10日由福建臨時省委改組而成）派遣謝國鑫（又名謝劍生）回龍巖重建縣委後，始再度開始工作。其中林一株任縣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則由龍巖黨員郭滴人擔任。⁵⁸順便一提的是，這位郭滴人與林一株相同，係日後積極參與肅社黨事件的迫害者。

另一方面，傅柏翠與王海萍則率領部分隊伍至永定溪南里金砂鄉古木督（張鼎丞之家鄉）與張鼎丞、鄧子恢等人會合，成立閩西特委（書記郭慕亮，組織部長張鼎丞，宣傳部長鄧子恢）與閩西暴動委員會（總指揮王海萍，副指揮為張鼎丞、鄧子恢及傅柏翠），並合編龍巖、上杭、永定三縣武裝為閩西紅七軍第十九師，下轄三個團，分別是由龍巖後田、永定太平里與上杭蛟洋組成的五十五團（團長傅柏翠），以及由永定湖雷隊伍組成的五十六團（團長熊振聲）與溪南里隊伍組成的五十七團（團長張鼎丞），時間大約在8月中旬。⁵⁹

此後，傅柏翠與張鼎丞曾率隊赴平和五坎地區（今永定湖山鄉一帶）以及上杭豐稔地區（原屬永定勝運里，後劃為上杭東五區）活動。在五坎地區，傅等人在該地活動了兩三天，拉了幾個「純粹流氓意識很重」，「大部分是看見

⁵⁷ 〈羅明關於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信〉（1928/10/10），*FJWJ*:8，頁22。

⁵⁸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11/21），*FJWJ*:8，頁32-33；〈中共福建省委十一月份黨的組織工作報告〉（1928/12/11），*FJWJ*:3，頁302。

⁵⁹ 關於閩西特委成立的時間以及太平里暴動的時間孰先孰後，一般史家的看法是，閩西特委成立於7月15日，而太平里暴動是在7月底8月初爆發的。然而，根據鄧子恢等人的回憶，王海萍應當是先到太平里領導暴動，失敗後始率暴動隊伍南下溪南里與張鼎丞等人會合，並於8月間成立閩西特委。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福建黨史資料》，第3輯，頁27-28；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頁12-13。當時的文件亦未曾提到7月15日這個日期，只有提及太平里暴動隊伍是在6月21日攻打龍巖城，閩西特委是在7月25日成立。這兩個日期應當是農曆，據此推算，太平里暴動應該是在7月中旬爆發，而閩西特委則是在8月中旬成立的。參閱：〈中共閩西特委給省委的報告〉（1928/07/20）、〈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11/21），*FJWJ*:8，頁5、32。

紅軍的威勢而投機進來的份子」組織蘇維埃，搞了一個滑稽的鬧劇；⁶⁰至於上杭豐稔暴動，雖旋即失敗，但該地日後亦成為閩西蘇區的中心赤區之一。

然而，此次傅柏翠與張鼎丞的合作，似乎是以不愉快的結局收場。據鄧子恢與張鼎丞所言，當時傅看到溪南里群眾分了田地，蛟洋的部隊因此也要求回家分田，傅便因此動搖了。⁶¹事實上，這種說法是很有問題的，蓋當時溪南里的群眾早已因「反動派」的壓迫而動搖妥協了（詳見後述）。筆者認為，傅柏翠及蛟洋隊伍不過是由於地方觀念作祟，想要回家罷了。事實上，不只是蛟洋隊伍，當時張鼎丞領導的溪南農軍也是一支地方性極強的隊伍，既「散漫無紀律」，又「多半是顧本村，很難調動作戰」，⁶²且完全不服從黨的意志（只注意軍事行動而忽略黨的工作，被批評是「暴動打倒了黨」），僅由少數領導黨員行英雄式的包辦，甚至黨員間搞意氣鬥爭。⁶³由此看來，張鼎丞等人對傅柏翠的批評，不過是張與傅兩位地方幹部間，以及溪南與蛟洋兩地農民間出於地方觀念的意氣之爭。

10月，甫自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歸來的羅明抵達福建。或許是由於當時福建部分黨員對他仍心存芥蒂（即前述王海萍對羅的批評），⁶⁴因此，羅一回來後便被派赴閩西巡視。羅抵達閩西後，發現閩西黨的工作在大部分地區已經塌台。永定溪南與金豐里的下層農民多要求與「反動派」調和，張鼎丞等人最初甚至以殺害調和分子的手段來反對調和，但後來仍是不得不允許群眾與「反動派」妥協；⁶⁵在龍巖及平和，黨員多忙於「捉肥豬」（即綁票、勒索）

⁶⁰ 〈中共福建省委對平和縣今後工作的指示〉（1928/12/25）、〈運康巡視平和的報告〉（1928/12/26），*FJWJ*:3，頁354、362。

⁶¹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頁28。

⁶² 〈羅明關於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1928/10/10），*FJWJ*:8，頁16。

⁶³ 〈閩西鬥爭意義與教訓的討論〉（1929/01/09），*FJWJ*:4，頁26-27。

⁶⁴ 〈雲和給元光的信〉（1928/08/20）、〈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緊急代表會議文件：對臨時省委報告決議案〉（1928/10），*FJWJ*:3，頁166、267。

⁶⁵ 〈羅明關於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1928/10/10），*FJWJ*:8，頁16-25。

的工作，以解決游擊隊的經濟問題，導致黨員貪污腐化，脫離群眾。⁶⁶閩西特委也在12月時，由於黨員盧冠卿的被捕告密，遭到破壞。⁶⁷

至於已回到北四區的傅柏翠，在經歷了太平里等暴動挫折後，加上經濟無法支持的緣故，愈來愈消極，「要退出黨，帶領十多個農民去當大哥，因該處農民信仰他」。⁶⁸為此，閩西特委乃派傅的好友羅明前去安撫他。而羅似乎也達成了他的任務。雖然傅並未完全擺脫其桀驁不馴的英雄心態，但至少還是以形式上的共產黨員名義領導農民從事游擊活動。順便一提的是，先前屢次提及的「發出怪論」阻礙暴動的林梅汀，在當時也由於「臨陣脫逃」的罪名，與太平里區委的部分黨員，遭到以張鼎丞等人為首的閩西特委開除黨籍的處分。⁶⁹但林梅汀當時仍率領隊伍至蛟洋活動，參加了傅柏翠的隊伍。⁷⁰至於林梅汀的同鄉林一株，則是與郭滴人留在龍巖活動。或許是由於表現良好的緣故，當時福建省委甚至打算徵召兩人到他地工作。⁷¹林一株、林梅汀兩位同鄉從此走上人生的歧路。

透過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早期閩西地方黨員的性格差異及其間的衝突。如日後被指為社黨分子的傅柏翠與林梅汀，皆表現出強烈的地方色彩，他們往往重視地方群眾利益更甚於黨的紀律，其中林梅汀還因為不遵守上層指示的緣故，遭到開除黨籍之處分。至於日後在肅社黨事件中扮演打手的林一株與張鼎丞等人，雖然同樣也多少帶有地方色彩與土匪流氓性格，但他們似乎較傅柏翠與林梅汀更熱衷於上層的暴動指示。加上傅柏翠與張鼎丞等人之間

⁶⁶ 〈中共福建省委給龍巖信〉（1928/12/18）、〈中共福建省委對平和縣今後工作的指示〉（1928/12/25），*FJWJ*:3，頁345、352-353；〈中共福建省委對龍巖縣委意見的答覆〉（1929/01/04），*FJWJ*:4，頁22。

⁶⁷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報告〉（1928/12/16），*FJWJ*:3，頁342。

⁶⁸ 〈福建省組織狀況一覽表（一）〉（1928/11），*FJWJ*:3，頁328。

⁶⁹ 〈中共福建省委十一月份黨的組織工作報告〉（1928/12/11），*FJWJ*:3，頁303；〈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各縣情況給省委的報告〉（1928/11/21），*FJWJ*:8，頁33、36。

⁷⁰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頁1022-1023。

⁷¹ 〈中共福建省委給龍巖信〉（1928/12/18），*FJWJ*:3，頁345。

的意氣之爭。由此可見，這些人日後在肅社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與他們早期的經歷存在著某種聯繫。

肆、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之衝突

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的衝突，是中日戰爭前中共各蘇區內部的普遍情形。一般說來，外來幹部較重視黨組織與紀律，且較易受上層路線之影響；而地方幹部與群眾的行徑則多帶有散漫、無組織的性格，並或多或少受到所謂傳統農民意識的影響。兩者性格之差異及由此而來的衝突，不言而喻。在閩西蘇區，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的衝突，自1927年國共分裂以來便時有發生（如前述王海萍對閩西地方黨員的批評），但最初仍不劇烈。自1929年朱德與毛澤東率領之紅四軍入閩西以後，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的衝突乃隨之加劇。1930年的立三路線則使此一衝突更進一步的白熱化，最終促成了隔年肅社黨事件的爆發。

1929年初，紅四軍由於國軍圍剿而被迫撤離井冈山並游擊至贛南一帶，並於2月初路過武平，後又在3月中旬抵達長汀縣，驅逐了駐軍郭鳳鳴部（郭戰死），占領了長汀縣城。中共福建省委得知此一消息，乃派謝漢秋前往閩西聯絡紅四軍。但紅四軍在籌得糧餉後便已離去，謝也撲了個空，只於4月中旬召開了上杭、龍巖、永定、長汀、武平五縣代表會，在上杭恢復了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後，便於5月初回到省委了。⁷²

1929年5月，由於贛軍的圍剿，紅四軍被迫再次入閩。⁷³在向長汀濯田前進途中，紅四軍捎了個信息給閩西特委說：「贛敵緊迫圍閩西。」當時閩西特委以為紅四軍只是要暫時到閩西避難，乃策劃地方暴動，以便必要時紅四軍可向連城、清流、歸化退去，並未計劃紅四軍久留閩西。⁷⁴究竟紅四軍是否在入

⁷²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組織報告〉（1929/07/29），*FJWJ*:5，頁50、59。

⁷³ 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江西省檔案館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下簡稱*JJGMGJD*:2），頁449。

⁷⁴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FJWJ*:8，頁118。

閩前便已有在閩西久留的計畫，我們並不清楚。不過，筆者猜測，紅四軍後來留在閩西活動，與傅柏翠的影響當不無關係。當紅四軍抵達連城廟前時，朱毛對於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感到相當猶豫，因此便請傅柏翠前來商量。⁷⁵當時傅可能向朱毛介紹了龍巖地方民團與駐軍陳國輝衝突的情形，並給朱毛介紹了劉烈波這個人。

劉烈波，據閩西特委的說法，是一位有80位囉嘍的投機匪首，且與閩西暴動後逃往蛟洋的永定太平里土匪有關。這些土匪不僅在反龍巖駐軍陳國輝部的立場上與中共一致，且「願受柏翠指揮」。⁷⁶事實上，殘暴的陳國輝部早已引起龍巖群眾的普遍不滿。如在1929年4月赴粵參與討伐桂系（第一次粵桂戰爭）前夕，陳部駐龍巖適中的林尙軒旅，「於出發時，並無何種原因，竟忽焚燒民房數座，更復騷擾洋邦鄉，致令該鄉百餘戶，均至無家可歸」。⁷⁷又，據當時報載，以劉烈波為首的龍巖諸民團，在駐閩南的張貞慫恿下，欲乘陳國輝赴粵參與第一次粵桂戰爭之際，占領龍巖縣城，驅逐陳國輝。⁷⁸

在傅柏翠與劉烈波等地方武裝協助下，紅四軍於5月下旬起先後數次占領龍巖縣城，最終迫使駐軍陳國輝不得不棄城逃跑；後又於6月初在上杭白砂擊敗上杭駐軍鍾銘清團。⁷⁹明顯的，紅四軍得以在閩西立足，傅柏翠可謂功不可沒。因此，傅被任命為閩西軍委（主席李任予）的一員，⁸⁰其所領導的五十

⁷⁵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49-50。

⁷⁶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5/11）、〈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FJWJ:8，頁51-52、103、136。

⁷⁷ 〈陳國輝部殘酷成性〉，《福建民國日報》，民國18年5月26日，版3。

⁷⁸ 〈共匪入劫龍巖前後詳誌〉，《福建民國日報》，民國18年6月3日，版3。又，據中共福建省委所言，當時「張貞與陳國輝搶龍巖地盤之爭日劇」。〈中共福建省委關於省委全會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29/05/23），FJWJ:4，頁231。

⁷⁹ 〈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FJWJ:14，頁130；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61-66。

⁸⁰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07/29），FJWJ:5，頁59。李任予，廣東新豐人，原名李濟道，又名李力一，早年在廣州、北平活動，1929年調閩西蘇區活動。王健英：《中國紅軍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08-309。

九團亦在白砂戰役後與永定湖雷、溪南隊伍，以及其他土匪部隊合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第七支隊（另有由上杭東五區等武裝所編成的第八支隊，隊長盧肇西），傅任第四縱隊的隊長（黨代表張鼎丞、政治部主任兼縱委書記李任予）。而劉烈波部也被改編為巖平寧游擊大隊，並由林一株擔任該隊的黨代表。⁸¹

隨後，自1929年8月17日始，傅柏翠的第四縱隊又與林彪的第一縱隊聯手圍攻上杭縣城。此一行動的目的，就閩西特委領導來說，是為了打通與活動於汀武杭三縣一帶（被劃為第二特區，蛟洋周圍地區則為第一特區），由「土共」羅化成、藍夏喬等人所領導的閩西游擊第二大隊之聯繫。⁸²不過，對於傅柏翠來說，攻打杭城的意義在於報一年前鍾銘清團血洗蛟洋之仇。9月20日，上杭縣城被攻破。「硬漢子」鍾銘清帶數百名士兵，來回衝殺，終究不敵，為紅四軍所擒，隔日槍決。傅柏翠終於報了當年血洗蛟洋之仇了！⁸³

然而，紅四軍雖與地方武裝先後多次合作擊敗了地方駐軍，但兩者的性格卻是迥然相異的。前者是一支重視組織紀律的隊伍，而傅柏翠等人所領導的地方武裝卻是散漫、不守紀律，且帶有強烈地方色彩的地方農民武裝。事實上，閩西地方武裝響應紅四軍的行動，有的僅是出於報復心態，如前述劉烈波所領導之龍巖地方武裝便是一個例子。又，據謝漢秋所言，不少自1928年平和縣長樂暴動失敗後被迫走避漳州一帶的平和黨員，在獲知朱毛紅軍來閩後，便立即回鄉活動，他們「都充分帶著十足的報復心理，果真動起來，一定非大燒大殺不可」。⁸⁴有的地方武裝則帶有趁火打劫的心態，如龍巖小池民團響應紅四軍的暴動，只是少數人的行動，當地群眾多莫名其妙，甚至「負責人財政上不

⁸¹ 〈中共龍巖縣委書記謝△△給省委的報告〉（1929/07/09），*FJWJ*:18，頁120。

⁸² 當時閩西特委批評該地領導黨員（汀南區委）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在面對敵人圍剿時，不進一步發動鬥爭，反叫農民秘密分散，致農民受到摧殘。〈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FJWJ*:8，頁97-98、109-110、124。

⁸³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頁168-169。

⁸⁴ 〈福建省特派員謝漢秋來信〉（1929/03/29），*FJWJ*:4，頁159。

分，凡繳來槍枝多落在不忠實份子手裡，以後便亂派捐款」，「實際上小池黨已經脫離了群眾」；上杭白砂戰役之際，傅柏翠及袁祖安所領導之隊伍，也燒殺擄掠當地群眾。⁸⁵這些胡亂燒殺，大多是地方農民趁火打劫或報復的行徑，是「農民意識充分表現的不好模樣」，因此被封上「土共」的渾名。後來閩西特委便將這些行為歸咎於第三黨的搗蛋，並處死了包括上杭白砂及龍巖東方「第三黨」分子袁祖安等人。⁸⁶

事實上，傅柏翠是當時最令紅四軍等外來幹部頭疼的地方幹部。1929年3月被福建省委派赴傅柏翠部工作的羅瑞卿，便常批評傅「農民意識」、「小資產階級意識」。⁸⁷又，紅四軍曾派了不少四軍幹部到四縱七支工作。這些外來的幹部，強加嚴苛的軍事訓練在四縱七支上，甚至欲予混編，引起了士兵及「當地農民領袖」的不滿。⁸⁸這裡的「農民領袖」，理所當然也包括了傅柏翠。

據日後閩西特委致傅柏翠信所言，閩西特委自1929年冬以來，即發現傅「在政治路線上和組織路線上有不少的錯誤」，並曾託毛澤東向傅說明，但傅並未接受。⁸⁹在攻下上杭後不久，紅四軍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閩西特委亦於10月15至18日在杭城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擴充每縱隊為三個支隊，第四縱隊下轄第十、十一、十二支隊，其中第十、十一支隊分別由原第七、八支隊編成。而縱隊長改由胡少海（湖南人，四軍幹部）擔任，由第七支隊改編的第十支隊亦改由張鼎丞擔任隊長，至於傅柏翠則改任縱隊黨代表（由第八支隊

⁸⁵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FJWJ*:8，頁119、129；〈各屬消息：上杭共匪蹂躪地方之情況〉，《福建民國日報》，民國18年7月23日，版3。

⁸⁶ 〈中共閩西特委關於反對第三黨改組派的欺騙政策與我應付的方法〉（1929/08/03）、〈閩西工作報告〉（1929/08/22），*FJWJ*:8，頁95-96、99、101。

⁸⁷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頁47、49。

⁸⁸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08/28），*FJWJ*:8，頁138-139。

⁸⁹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的信〉（1930/04/27），江西省檔案館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下簡稱JJMGJD：1），頁591。

改編的第十一支隊仍由盧肇西領導）；而原來的縱隊委書記李任予則調二縱隊工作，由譚震林接任其職務。⁹⁰在此一人事調整中，傅柏翠被剝奪了軍事領導權，其縱隊長及原七支隊長之職，分別由紅四軍幹部及張鼎丞所取代。據後來閩西特委的說法，此一調整乃由於傅「不講軍事，又無緊張工作精神，弄得四縱隊無甚頭緒」，不得不調其改任黨代表；然而，傅卻因此大為不滿，「借故請假終不回部工作，委以上杭總隊長職亦不肯就，老住蛟洋，大發牢騷，影響到蛟洋群眾異常消沉」。⁹¹明顯的，傅是由於其英雄心態及地方觀念，引起紅四軍及閩西特委其他領導幹部等的不滿，因此被剝奪軍權的。

然而，傅柏翠雖被剝奪軍權，但閩西特委卻不敢對其採取更嚴厲的組織手段，甚至還任命其為特委委員兼財政部長（但傅仍是調而不動，不願就職）。⁹²閩西特委所以對傅妥協，與傅在蛟洋是一具有極大影響力之地方群眾領袖不無關係，一旦將其開除黨籍（或逮捕處死），其後果恐怕不堪設想。故閩西特委在批評傅之餘，亦不無為難地說：「像這樣能力有限又不受支配的同志，實屬難於處置，望省委設法調開。」⁹³

閩西特委對傅柏翠的妥協態度，正描述了中共在閩西發展的困境。蓋當時與傅有相同性格的地方幹部與群眾並非少數，如據閩西特委所言，「農民群眾充分表示享樂，只顧得各謀生活不積極向外擴大，保守主義相當濃厚，怕當紅軍，怕調動，怕出來工作，甚至放哨、警戒工作都懶得幹」；逼不得已，也只願意作地方游擊隊或赤衛軍，蓋赤衛軍與游擊隊都是「當地數十里內游擊」，且「赤衛軍不是經常集中」，此明顯是由於農民「不願遠離鄉中」，「是農民的地方觀念保守主義的餘毒」。⁹⁴似此類「保守的農民意識」，將伴隨著中共在閩西蘇區採取更激進的路線而愈加凸顯。

⁹⁰ 〈巡視員謝運康給福建省委報告〉（1929/10/25），*FJWJ*:5，頁367-368。

⁹¹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五號〉（1930/01/10），*FJWJ*:8，頁163。

⁹²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的信〉（1930/04/27），*JIGMGJD*:1，頁592。

⁹³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五號〉（1930/01/10），*FJWJ*:8，頁163。

⁹⁴ 〈中共閩西特委報告第一號〉（1930/11/29），*FJWJ*:8，頁206-207。

1930年1月初，由於國民黨之圍剿，紅四軍退往贛南，閩西蘇區頓失正規紅軍之保護，幾瀕崩潰邊緣。當此之際，由於閩北駐軍盧興邦綁架福建省政府委員林知淵等六人所爆發的「一·六事件」，迫使張貞等圍剿軍隊紛紛退走，由於「洋共」（即指紅四軍）離去而感到空虛的閩西「土共」，也因此鬆了一口氣。⁹⁵然而，當時中共閩西黨並未乘此機會鞏固內部，蓋不久後蘇區領導便為閩西紅軍出東江一事陷入了爭論。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主導下，指示閩西紅軍出擊東江。為此，閩西紅軍乃合編為紅十二軍，下轄六團，由鄧偉任軍長，高靜山任政委。⁹⁶然而，由於十二軍士兵多地方赤衛隊出身，地方性頗強，以致各團紅軍只願留在各縣，拒絕出擊東江。如第一團便說要鞏固龍巖，第五、六團則說要先打連城，後來「經過了與黨內地方主義鬥爭後」，紅軍才集合起來，並於5月間向東江出發，後方僅留下由巖杭永三縣赤衛隊合編的紅二十軍（軍長胡少海）。此次出擊東江，最初雖頗有斬獲，但最後則是大敗而歸，紅十二軍狼狽逃回閩西。⁹⁷

明顯的，閩西蘇區強烈的地方色彩，使得中共中央向外出擊的路線無法順利實現。正當此時，紅四軍再度來到，替中共中央解決了此一難題。紅四軍於6月初來到閩西，並於6月11日起九日間，先後在南陽及長汀縣城召開了紅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前面提及的王海萍（於5月1日抵達閩西⁹⁸）與甫

⁹⁵ 〈中央巡視員家霖巡視福建情況報告〉（1930/02/23），*FJWJ*:6，頁375。

⁹⁶ 該六團是由地方武裝改編而成，分別是龍巖第一團，上杭第二團，永定第三團，連城第四團，武北、汀南合編之第五團，以及上杭的第六團。另外，鄧偉當時是紅軍學校的政治教官兼代理政治委員，曾參加過東江暴動，後在紅四軍工作；高靜山則曾在湖南領導農民暴動，後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鄧、高兩人身體皆不好，有肺病。〈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FJWJ*:14，頁147、150；〈漢秋關於福建全省群眾組織情形報告〉（1930/07/13），*FJWJ*:6，頁287-288。

⁹⁷ 〈福建總行委給南方局的報告〉（1930/10/05），*FJWJ*:6，頁316。

⁹⁸ 〈中共閩西黨第二代表大會日刊〉（1930/07/08-20），*JIGMGJD*:1，頁281。

自上海歸來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閩西代表郭滴人等人，皆參與了會議。該會議決議紅二十軍（名義取消）、紅十二軍大部分，偕紅四、六軍北上向南昌及九江發展，僅留下由紅四軍第四縱隊及紅十二軍第一縱隊合編成的紅二十一軍（軍長胡少海，政委鄧子恢）在閩西活動。⁹⁹然而，當時閩西士兵極不情願赴贛南作戰。據日後被派赴閩西工作的劉伯堅所言，過去曾隨紅四軍赴贛南的閩西士兵，在回到家鄉後，到處宣傳紅軍生活是如何的辛苦，以致群眾多不願參加紅軍。¹⁰⁰明顯的，閩西地方黨與紅軍在此一會議中是處於被動地位的。而王海萍等外來幹部所以能夠順利改編閩西紅軍並迫其向外出擊，毫無疑問，紅四軍的支持起了重大作用。

閩西紅軍所遭受的打擊尙不僅止於此。1930年7月8日至20日，中共閩西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由於曾反對出擊東江，並主張向漳州出擊，故在此會議中被迫作自我批評，承認向漳州出擊的路線是「只站在閩西本身，立場仍是保守主義」；此外，王海萍還大罵閩西黨保守、貪污腐化，農民滿足於土地革命、苟安享樂的傾向。¹⁰¹最後，大會重提了向東江發展等激進路線。又，鄧子恢於會後被免除了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閩西特委書記及二十一軍政委的職務，並由於被指控貪污與任用私人，¹⁰²以及遭到王海萍等打壓的緣故，¹⁰³被迫調離閩西。鄧所留下的遺缺，分別由郭滴人（閩西特委書記）、張鼎丞（閩西政府主席）及李任予（二十一軍政委）取代。

明顯的，向外出擊的路線在閩西二大上大獲全勝。然而，事實證明，這個

⁹⁹ 〈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調查局資料：255.31/813/9300；〈福建省委關於閩西、閩北紅軍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0/06/19），*FJWJ*:6，頁228。

¹⁰⁰ 〈劉伯堅關於閩西軍校報告〉（1930/11），*FJWJ*:8，頁186。

¹⁰¹ 〈中共閩西黨第二代表大會日刊〉（1930/07/08-20），*JIGMGJD*:1，頁276-277、282。

¹⁰² 〈福建省委第五次執委擴大會議紀錄〉（1931/02/27），調查局資料：255.31/7135/58559；〈檢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930/10/20），調查局資料：255.35/814/11195。

¹⁰³ 王海萍在日後仍不斷打壓鄧子恢，如鄧被調赴莆田工作之初，王便批評其退縮，不敢擔任工作。參閱：〈莆田盧哇利報告〉（1930/11/28），調查局資料：294.541/2190/11017。

勝利只是暫時的，僅僅是撤換鄧子恢，並不能完全震懾閩西蘇區的「保守心態」。8月9日，新編的紅二十一軍出擊東江，再度遭到慘敗，「幾乎使二十一軍全體瓦解」，¹⁰⁴不得不於9月初撤回閩西。隨後，紅二十一軍攻打永福和適中，同樣遭到慘敗，領導閩西總行委（9月初成立）的王海萍與李任予對此非常不滿，批評二十一軍的屢次失敗，是由於閩西地方幹部強烈的地方觀念有以致之，¹⁰⁵李任予甚至還說「失去一個龍巖有什麼要緊」。¹⁰⁶為提振因屢次失敗而低落的士氣，以及解決經濟問題，二十一軍於9月中旬攻打上杭縣城。然由於事前動員群眾工作不周，以及紅軍輕敵、缺乏紀律（官抓不住兵，大家高興就打，不高興就退）等原因，此一行動以慘敗告終。¹⁰⁷隨後，中共福建省委為應付即將到來由閩南張貞所領導的圍剿，乃指示王海萍等人首先「集中和擴大武裝鬥爭的力量向漳州方面發展」，其後才是「向東江擴大與更大敵人決鬥」。¹⁰⁸但紅二十一軍不僅拒絕了此一指示，反而到連城去「整頓隊伍，徐圖長進」，甚至還以紅軍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為由，「以命令漫罵的態度」回覆王海萍。¹⁰⁹明顯的，王海萍等外來幹部尚未能完全掌控閩西紅軍，紅軍領導仍是

¹⁰⁴ 〈劉伯堅關於閩西軍校報告〉（1930/11），*FJWJ*:8，頁186。

¹⁰⁵ 根據王海萍及李任予的報告，紅二十一軍是在甫自東江歸來後不久前去攻打永福及適中的，閩西特委對此事相當支持，王海萍及李任予則持反對態度。〈二十一軍軍委書記李任予報告〉（1930/09/21），*FJWJ*:8，頁167-168；〈閩西特委致省委函—關於廿一軍攻永福情形〉（1930/10/16），調查局資料：255.35/813/9227。

¹⁰⁶ 〈二十一軍軍委書記李任予報告〉（1930/09/21），*FJWJ*:8，頁165-167。當時王海萍也曾說過：「為了爭取全國勝利，暫時犧牲閩西一部分。」由此可看出王海萍與李任予是同一類型的人物。〈福建省委第五次執委擴大會議紀錄〉（1931/02/27），調查局資料：255.31/7135/58559。

¹⁰⁷ 〈閩西特委來信〉，調查局資料：255.35/813/9227；〈福建總行委給南方局的報告〉（1930/10/05），*FJWJ*:6，頁317。

¹⁰⁸ 〈福建省委致閩西行委函〉（1930/10/01），調查局資料：255.35/813/11989。

¹⁰⁹ 〈閩西特委致省委函〉（1930/10/16），調查局資料：255.35/813/9227；〈福建省委致閩西行委函〉（1930/10/01），調查局資料：255.35/813/11989；〈福建省總行委給南方局的報告〉（1930/10/05），*FJWJ*:6，頁317。

「固執己見」。¹¹⁰因此，王海萍等乃於10月7日改編紅二十一軍為十二軍（為區別於過去的紅十二軍，以下稱新十二軍），軍長左權（於20日始到閩西，此間由賀沈洋代軍長職），政委施簡，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並成立工農革命委員會為閩西最高黨政軍指揮機關，由施簡任主席。¹¹¹然而，此時國民黨大規模的圍剿已是迫在眉睫。

就在閩西紅軍屢戰屢敗當中，傅柏翠仍隱居在其家鄉蛟洋作山大王。雖然當時閩西特委對傅採取了較嚴厲的態度（郭滴人指傅為富農分子），¹¹²但傅仍是一貫的桀驁不馴，「天天在那裡罵縣委罵縣政府」，甚至拒絕在其家鄉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土地政策，反而組織「共家團」，搞起了「共家運動」。¹¹³從日後傅柏翠反對閩粵贛特委合併各縣各區的「合區」政策，¹¹⁴以及同一時期其他蘇區內部類似的情形看來，所謂的「共家團」，可能是藉由某些中國傳統農村人際關係（如家族等）的聯繫，所形成的以地方菁英為領導，且經濟上「共產」的組織形式。¹¹⁵這類組織實際上是當時蘇區內部菁英與群眾抗拒激烈階級革命的手段之一。

更令閩西領導惱火的是，傅柏翠自四縱隊退出後，曾帶了一些槍枝回到蛟

¹¹⁰ 〈致閩西指示函〉（1930/10/07），調查局資料：255.35/813/11990。

¹¹¹ 〈左權、施簡報告〉（1930/12/29），*FJWJ*:8，頁240-242。

¹¹² 郭滴人在1930年5月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評論蛟洋暴動時說，該暴動「在富農領導之下，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沒有深入土地革命的鬥爭，不向外發展，結果受軍閥的摧殘而失敗」。這裡的富農便是傅柏翠。〈閩西出席全國蘇代會代表的報告〉（1930/05/18），*FJWJ*:14，頁129。

¹¹³ 〈中共閩西特委致柏翠同志信〉（1930/04/27），*JIGMGJD*:1，頁592-594。

¹¹⁴ 〈中共閩粵贛特委給北四區全體同志信〉（1931/01/06），中央檔案館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年)》（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以下簡稱*MYGSQ*:1），頁10-12。

¹¹⁵ 同一時期鄂豫皖蘇區的內部也曾出現「共生村」的組織，該組織由十家共成一伙，老小分開，紀律甚嚴，其領袖多為過去的地方菁英分子出身。鄂豫皖蘇區領導批評這是「富農」等階級異己分子「藉傳統家族的共產主義形式來延長其統治」。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頁413。

洋，「擁槍自重」，拒不交出武裝。據傳個人所言，他所以拒不交出武裝，是為防禦鄰近「反動派」的報復。¹¹⁶事實上，傅柏翠擁槍自重的行徑，可說是1930年以來，閩西蘇區地方幹部及群眾之地方觀念在紅軍向外發展屢戰屢敗中愈加強化的反映。如前所述，大部分地方幹部及群眾皆由於強烈的地方觀念，不願隨正規紅軍前往外地作戰，寧願擔任地方赤衛軍保衛地方。由於閩西紅軍的屢戰屢敗，此一情況愈加嚴重。說明此一情形的最佳例子就是，紅軍內「開小差」的現象日益增多，甚至連縱隊司令、大隊長，以及政委都有開小差的；許多黨員往往在逃兵事件中先行逃跑，「如果因此開除他，他很樂意」，蓋「平時就認為在黨很不自由，多開會多作事，受許多苦，不如開除在黨外好些」，如此也難怪閩西紅軍有「豆腐軍」的渾名。為此，不少下級領導為達成上層擴軍的目標，不得不採取「強迫、指派、抽籤、輪流、僱傭、欺騙、選舉」等方法，以致群眾大起恐慌。¹¹⁷明顯的，立三路線在閩西蘇區的執行，加深了長期以來地方幹部及群眾與上層和外來幹部間的裂痕。

綜上所述，自1929年紅四軍入閩以來，閩西蘇區地方幹部與外來幹部性格之差異與衝突愈加凸顯。在此一過程中，如傅柏翠與鄧子恢般帶有較強烈地方色彩或採取較緩和之路線的地方幹部，被迫退隱鄉間或遭到調職之處分，而由較激進的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如郭滴人、張鼎丞等）所取代。無疑的，這些衝突的發展與人事的安排，有意無意的為即將到來的肅社黨事件作好了準備。

伍、肅社黨事件的爆發及其經過

根據前幾節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或地方幹部之

¹¹⁶ 〈柏翠同志致子恢的信〉，JIGMGJD:1，頁597。

¹¹⁷ 〈中共閩西特委擴大會議決議案〉（1930/10/22）、〈二十一軍軍委代表陳正關於軍隊情況的報告〉（1930/10/23）、〈劉伯堅關於閩西軍校報告〉（1930/11），FJWJ:8，頁174-175、181、186。

間，以及黨員與群眾之間，自閩西蘇區創建以來，便不斷的由於地方觀念、上層欲加強對下層之控制，以及私人意氣之爭等因素而經常發生衝突，紅四軍的到來與1930年的立三路線則加劇了這些衝突。同年底鄧發的到來以及隨後國民黨圍剿形勢的加強，則起了導火線的作用，引爆了血腥的肅社黨事件。

11月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部長抵達龍巖，召集閩西特委擴大會，傳達六屆三中全會的新指示，恢復了閩西特委。而擔負成立閩粵贛蘇維埃特區之工人階級出身的鄧發，亦於10月間抵達東江蘇區的大南山，召開閩粵贛邊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成立閩粵贛特委（書記鄧發）。12月上旬，鄧抵達龍巖，召開閩粵贛蘇區黨代表大會，傳達成立閩粵贛特委的決議。不過，該特委實際上只領導閩西地區，對粵東、贛南大部分地區則是鞭長莫及。¹¹⁸

當此之際，閩南駐軍張貞已在12月初設指揮部於龍巖適中，準備對閩西蘇區展開大規模之圍剿。¹¹⁹然而，儘管外界剿共聲浪甚囂塵上，不少蘇區幹部卻以為「這是福建省委的過分估量」，甚至說「張貞和香翰屏等，絕對沒有力量來向閩西進攻」，故僅留「數百無戰鬥力的政治保衛隊」在龍巖縣城，以致國軍開始圍攻縣城時，「同志和群眾都一樣起了很大的恐慌，準備退出龍巖，準備跑」。¹²⁰12月15日，張貞部輕易地攻占了龍巖；3日後，永定縣城亦被攻克。明顯的，當時閩西蘇區的黨員及群眾已被此一「突如其來」的圍剿嚇得不知所措，即使反擊，也只是「沒有計劃、沒有組織」的行動罷了。¹²¹

毫無疑問，為了應付國軍之圍剿，鄧發等特委領導必須設法穩定局面及加強對蘇區內部的控制，這是我們在探討肅社黨事件時所不得不考慮的背景因素。當然，這並非是引爆肅反的唯一動機。事實上，閩西黨自11月初接獲六

¹¹⁸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49-156。

¹¹⁹ 〈張師限期出兵閩西剿除共匪〉，《福建民國日報》，民國19年12月8日，版2。

¹²⁰ 〈福建省軍委關於十二軍的報告〉（1930/12/16）、〈中共福建省委給南方局的報告〉（1930/12/20），*FJWJ*:6，頁357-358、360；〈龍巖已經張師收復〉，《福建民國日報》，民國19年12月18日，版2。

¹²¹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信〉，*FJWJ*:7，頁15。

屆三中全會決議以來，便以反立三路線等名義，接連批鬥了李任予、賀沈洋等諸位幹部。¹²²不過這些被批鬥者，在當時並未立即被開除黨籍，最多只是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與此相較下，傅柏翠的案例可說是一個例外。在鄧發的主導下，1930年12月初所召開的閩粵贛蘇區黨代表大會，以違背黨組織紀律之名，開除了傅的黨籍。¹²³明顯的，傅所以遭到整肅，與其長期以來桀驁不馴、頑抗上級的態度不無關係。事實上，在開除傅黨籍之前，閩粵贛特委曾派羅壽春等人前去與傅談話，希望他能糾正其錯誤行為（如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合區」政策），但傅仍堅持「一貫的主觀偏見」拒絕自我批評。此外，傅所以被開除黨籍，與鄧發的個人因素亦不無關係。蓋作為一位初到閩西蘇區的外來者，鄧並不了解傅在地方上的勢力，同樣也不會有其他人的顧慮。正如鄧發在日後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言，閩粵贛特委工作的一項進步就是：開除了從來不服從黨，而特委「敢」開除的傅柏翠。¹²⁴

然而，出乎鄧發的意料之外，在傅柏翠的領導下，上杭北四區二百多位黨員集體退黨，地方黨部與政府一概取消，甚至擺出與閩西蘇維埃政權武裝敵對的態勢。作為閩西中心蘇區之一的北四區，便在傅的一聲疾呼下，一夕之

¹²² 李任予所以被批鬥，一方面係由於他曾是立三主義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的愛人黎樹容之死，致其「時常哀挽悲痛消沉，分配他在十二軍政治部工作不積極，轉來中央」。而賀沈洋則是在代理十二軍軍長時引起黨內諸多同志的不滿，批評是「賀沈洋主義統治十二軍」。隨後，賀主動要求赴中央，卻被中央發現，他仍與被開除黨籍的「取消派」分子李伙生保持往來，故中共中央於3月底以「甘心為取消派作黨內暗探，自絕於無產階級的隊伍」之罪名，開除了賀的黨籍。〈劉作撫致中央的信〉（1930/11/22）、〈徐萍向黨中央報告〉（1931/01/14），*MYGSQ*:1，頁1、15、20-21；〈中央通知第二一六號〉（1931/03/31），調查局資料：245.2/804/13798。

¹²³ 〈中共閩粵贛特委開除傅柏翠黨籍的通知〉（1931/01/27），*MYGSQ*:1，頁24-26。必須強調的是，在傅柏翠被開除黨籍時，閩粵贛特委仍在六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之影響下。直迄1931年2月下旬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召開，特委始接受了六屆四中全會之路線。參閱：〈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02/27），*MYGSQ*:1，頁29。

¹²⁴ 〈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02/27），*MYGSQ*:1，頁34。

間完全垮台。因此，閩粵贛特委乃改變態度，致函傅要他再作考慮，並且還要求傅的好友羅明也寫信給他，「看他能否糾正」。畢竟北四區對於閩西蘇區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況且適值國軍圍剿，因此，除非到最危險的關頭，不能輕用「最後的辦法解除他們的武裝」。¹²⁵然而，傅不僅拒絕了閩粵贛特委與羅明的勸告，甚至打算乘新十二軍前往長汀、連城配合被剿共軍所迫退往瑞金、寧化、石城之紅三十五軍（鄧毅剛部）以及舊十二軍（1930年6月隨紅四軍北上贛南的十二軍）等部之際，連絡蘇區內部的「動搖份子」於3月15日進行暴動。為此，新十二軍乃急忙從汀連趕回，於3月13日至20日間三次攻打蛟洋及其鄰近的大池、小池地區。諷刺的是，傅採取了紅軍的游擊戰術來對抗紅軍。在新十二軍打入蛟洋後，鄉內只剩幾個老人家，其他群眾都隨傅「上山」去了！這些老人家看到新十二軍後大罵：「閩西政府與上杭縣蘇已反動了，過去強人當紅軍，現在紅軍殺人！」並說：「傅先生是好的，他救我們窮人，你說他反動，我敢殺頭擔保。」新十二軍便在群眾的怨聲載道下，悻悻然地撤離了蛟洋。¹²⁶傅在地方上勢力之大，由此一目瞭然。

在傅柏翠已堅決地走上反黨之路後，閩粵贛特委爲了與傅爭取群眾及避免其他群眾被傅所影響，不得不採取「最後的辦法」，那就是給傅打上反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烙印。然而，爲什麼閩粵贛特委要選擇社會民主黨，而不是如中央蘇區的AB團或鄂豫皖蘇區的改組派呢？如前所述，社會民主黨即所謂第三黨。中共福建黨向來視駐守閩南的張貞爲福建第三黨的代表，稱其爲第三黨中的「江董琴派」。¹²⁷該黨不僅阻礙了閩南與閩西革命的發展，還拉攏了不少福建共黨內的動搖分子（如陳祖康、張余生等），因此，是福建黨急欲去之而後

¹²⁵ 〈中共閩粵贛特委給羅明的信〉（1931/01/31），MYGSQ:1，頁27-28。

¹²⁶ 〈家、弼、霖自閩粵贛蘇區來信〉（1931/03/23）、〈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二號〉（1931/03/28）、〈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三號〉（1931/04/07），MYGSQ:1，頁73、80-84、111。

¹²⁷ 正之：〈第三黨內幕〉，《列寧青年》，1卷1期，調查局資料：052.1/7422/15556 v.1 n.1。

快的眼中釘。而傅過去與叛黨分子陳祖康等人的親密交往，正好給了閩粵贛特委一個藉口。正如日後中共在論及社黨在閩西蘇區發展的歷史時所言：1928年6月，共產黨叛徒陳祖康與張余生諸人，投靠了社會民主黨，並進一步藉其閩西同鄉等關係，拉攏閩西內部的共黨動搖分子，從此社黨打入閩西根據地內部；迄1931年初，社黨「頭目傅柏翠首先在上杭北四區宣佈獨立」，始將該黨反革命的面目暴露在群眾面前。¹²⁸

另外，根據當代大陸學者的觀點，傅柏翠並非肅社黨事件下的第一位受害者。據云，1931年1月，在新十二軍召開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大會上，有人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的口號，導致林梅汀等十二軍領導被捕，於3月以社黨分子名義遭處死。另有一些被懷疑及追捕的社黨分子，逃亡至蛟洋地區，致使傅也被當成社黨分子。¹²⁹儘管我們沒有足夠證據來證明究竟誰才是第一位肅社黨事件下的受害者，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肅社黨事件的爆發，與當時閩粵贛特委為加強對地方及軍隊控制的意圖（如把1930年以來紅軍內部的動搖、逃兵現象，皆歸咎於社黨搗亂的緣故），¹³⁰以及該被害者過去的歷史，並非毫無關係。而從當時閩粵贛特委論及肅社黨事件的文件中經常提及傅柏翠與社黨的關係（卻較少提及林梅汀）一事看來，打擊傅柏翠確實是閩粵贛特委所以要發動肅社黨事件的主要動機之一。

至於林梅汀被殺的原因，恐怕也不見得只是有些人喊錯口號的問題而已。如前所述，林在1928年太平里暴動時，曾因對暴動動搖等緣故而受處分。又，林等太平里部分黨員也是由叛黨分子陳祖康介紹入黨的（甚至還說要他們工作，只有靠陳的信），與傅柏翠的關係亦不錯（暴動失敗後林前往蛟洋活動）。理所當然的，這些曖昧的私人關係，成為林參與社黨的最佳「罪證」。另外，根據外界的報導，林梅汀在被捕前是在太平里一帶活動。太平里與當

¹²⁸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

¹²⁹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7-189。

¹³⁰ 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

時閩西蘇維埃最高領導所在地虎崗相近，且由於國軍的圍剿，太平里地區早已人心惶惶。¹³¹又，根據前述，當時傅柏翠有聯絡蘇區內部動搖分子，於3月15日進行武裝暴動的計畫。據此推論，林可能不過係一位因國軍圍剿而動搖的分子，加上其與傅的關係，故閩粵贛特委懼其與傅聯手暴動進攻虎崗，乃以社黨之名，將其處死，以清臥榻之側。

根據當時「反動派」的報導，肅社黨事件下的受害者，以當地出身的知識分子居多，蓋這些知識分子，「難免有地方觀念，或退有怨言，或陰謀反正」等等。¹³²似此類看法，亦非完全是「反動派」的造謠而已。如前所述，閩西蘇區最初便是藉由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建立。這些知識分子（即使是那些被提拔上來取代他們的工農分子幹部）的行為同時受到政治因素、自身利益，以及地方群眾利益的影響。一旦蘇區黨採取愈加激進的路線，或在國民黨圍剿形勢更加嚴苛的情形下，這些知識分子黨員難免會「退有怨言」，或「陰謀反正」，如傅柏翠便是個例子。當然，情形並非總是如此。如1930年取代鄧子恢職位的林一株、郭滴人、張鼎丞三人，在閩西蘇區肅社黨事件時期，仍忠實於上層指示，並成為肅社黨事件的忠實打手。

隨著國軍圍剿的愈加深入，蘇區內部「陰謀反正」的行為日益增多，而閩粵贛特委為遏止此反水之風所採取的肅反手段，卻恰好起了為淵驅魚的反效果。以永定縣的肅反為例，3月中旬後，閩西的圍剿與反圍剿戰役轉移至以永定為中心，此一期間的戰役中，雖然新十二軍間有勝利，但整體說來是節節敗退的。據閩粵贛特委4月初的報告，永定的湖雷（永定縣蘇所在地）、坎市、龍崗（永定縣城），東鄉的高頭、奧查，以及與平和交界的大象湖等地，皆為剿共軍所奪。¹³³隨後，剿共軍以這些大城鎮為中心，向四周的赤區進行掃蕩。

¹³¹ 〈閩西赤匪亡在旦夕〉，《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4月2日，版1。

¹³² 〈閩西赤匪內訌日甚〉，《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7月17日，版1。

¹³³ 〈平和邊境匪患告平〉，《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4月5日，版1；〈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三號〉（1931/04/07），MYGSQ:1，頁104。

¹³⁴不少地方黨政軍領導，在此嚴苛的環境下，紛紛倒戈投降，如金豐里奧查的武裝便在4月間發生叛變。¹³⁵根據當時外界的報導，此一事件可能是黃元洪、盧錫鵬等人所領導的金豐里少年先鋒隊等地方武裝，聯合地方民團，於4月30日，衝入永定蘇維埃政府，欲行暴動，然由於事跡敗露，永定縣蘇早有準備，遂歸失敗，事後約有二十多人遭到槍斃。¹³⁶閩粵贛特委因此對永定縣黨政軍領導大為不滿，蓋金豐里地方武裝的叛變已不是第一次，何以地方領導未加以防備；加上縣委書記的奇怪舉止（縣委書記曾致函閩粵贛特委反對將永定地方武裝編入十二軍，又說「因為我是永定人，怕你們說我地方主義」）等等。¹³⁷為此，特委決定撤銷永定縣委書記及軍委主席職，隨後又發現縣蘇主席及軍委主席皆社黨分子，乃予以逮捕，並一舉破獲了永定社黨集團，拘留了二百多人。

138

再以杭武縣（1930年，閩西蘇維埃政府合併上杭、武平二縣而成）之肅反為例。在5月27日晚，閩西蘇區杭武縣第三區（即大洋壩、太拔一帶）蘇維埃政府農工武裝第一大隊隊長（蔣伯英教授認為是第三大隊）李真等人，包圍位於坑口的區委機關，並扣押了巡視員羅壽春（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杭武軍委丘致和等人，劫去閩西農工銀行存於大洋壩的現洋數萬元，強迫區委書記寫信給閩粵贛省委（由閩粵贛特委於5月底或6月初改編而成，鄧發仍任書記），¹³⁹威脅立即釋放（或交由地方審判）該區先前以社黨名義遭逮捕的區委書記何登南等人，此即所謂坑口事變。此事件的結果，羅壽春等人逃出，而叛

¹³⁴ 〈中共閩粵贛特委給永定縣委的指示信〉（1931/05/01），福建省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閩粵贛邊區革命歷史檔案彙編（1930.12-1935.12）》（出版地不詳：檔案出版社，1987年，以下簡稱MYGBQ:1），頁73。

¹³⁵ 〈中共閩粵贛蘇區特委給永定縣委的信〉（1931/04）、〈中共閩粵贛特委給永定縣委的指示信〉（1931/05/01），MYGBQ:1，頁71、74。

¹³⁶ 〈閩西赤匪殺被騙之智識份子〉，《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6月19日，版1。

¹³⁷ 〈中共閩粵贛特委給永定縣委的指示信〉（1931/05/01），MYGBQ:1，頁75。

¹³⁸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一號〉（1931/06/10），MYGSQ:1，頁183。

¹³⁹ 林天乙主編：《中共閩粵贛邊區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頁97。

變者的要求亦未達到；至於反叛者，有說被捕處死，有說投靠剿共軍隊。在5月30日，又有杭武縣第二區（過去上杭東五區稔田一帶）群眾派代表至閩西蘇維埃政府要求釋放該地黨員丘柏琴（稔田人），並於6月1日扣押區委及區書記等人（事件結果不詳）。¹⁴⁰由其他蘇區同一時期所發生的類似事件推測，此二事變可能皆是地方群眾為拯救被蘇維埃政權逮捕、且在群眾間極有威望的群眾領袖而起來暴動的。¹⁴¹雖然由於史料局限，吾人無法獲知此二事件的後續發展，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自此之後，中共在上杭東部的控制力量大為減弱，其中第二區日後甚至如同傅柏翠的蛟洋般，被視為「社黨大本營」。¹⁴²

涉入肅社黨事件的受害者，如滾雪球般，日漸增多。據閩粵贛特委4月份的報告，當時他們已逮捕了四、五百名的社黨分子，其中有二百餘人被槍決；在5月份一個月，逮捕了六百人左右，槍決了一百九十餘人；在6月份一個月則更是誇張，總共槍決了八百二十四名社黨；整整半年來，合計被槍決的社黨分子已不下二千人了。¹⁴³明顯的，社黨被破獲人數的逐月增加，與圍剿情勢的愈趨嚴厲有直接關係。不過，當時閩粵贛省委早已是殺到興起了，不僅在蘇區內大肆屠戮，甚至還懷疑福建省委與中央內部也有社黨分子。¹⁴⁴

¹⁴⁰ 關於坑口事變及東五區事件，請參閱：〈中共閩粵贛省委關於杭武第三區社會民主黨反革命暴動事變的決議〉（1931/05/29）、〈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號〉（1931/06），MYGSQ:1，頁158-160、170-173；〈閩西偽農工部長悔悟反正〉，《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7月2日，版1；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6-197。

¹⁴¹ 1932年初，鄂豫皖蘇區黃安縣仙居區的地方群眾亦曾要求區委書記寫信給黃安縣委、縣蘇，及縣保衛局（負責肅反機構），將該地先前以反革命之名遭到逮捕的地方幹部，交回地方公審。當時鄂豫皖省委則以血腥鎮壓的方式（一百多人遭逮捕審判，63人遭處死），結束此一事件。參閱：鄂豫皖：〈鄂豫皖蘇區三〇、三一年時一些左傾的政策（這材料是根據袁克服等同志談話整理的）〉，湖北省檔案館典藏資料：GM2-1-120(1)；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頁413-414。

¹⁴² 〈閩粵贛蘇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報告〉（1931/09/03），MYGSQ:1，頁296。

¹⁴³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閩西政治形勢及武裝鬥爭狀況〉（1931/06/24）、〈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六月份的工作總報告〉（1931/07/15），MYGSQ:1，頁128、217、231。

¹⁴⁴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1931/06/22），MYGSQ:1，頁207-208。

除永定與杭武縣的肅反外，閩粵贛特委亦未曾絲毫放鬆對傅柏翠的「圍剿」。自從傅與閩粵贛特委決裂後，蛟洋周圍地區完全成了人間煉獄，紅軍與「傅黨」常常在此燒殺劫掠。當時閩粵贛特委由於軍事上無能剿滅傅黨，便對北四區進行經濟與交通封鎖。¹⁴⁵據外間的報導，在上杭北路被指為傅黨的民眾，皆被限制自由，不准寄人籬下，也不准離開「匪區」，甚至不准其他民眾周恤或僱用。¹⁴⁶為應付此一封鎖，傅經常率蛟洋群眾至上杭北區及連南等地劫掠。¹⁴⁷傅的策略確實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據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所言，在4月時，從北四區到連南廟前一帶，已完全成了傅的勢力範圍。¹⁴⁸

又，據閩粵贛特委所言，傅還打算聯絡進攻龍巖大池、小池的張貞師楊逢年旅。¹⁴⁹4月底，傅遣上杭民團主席賴子欣前赴龍巖縣城與楊逢年磋商，表示「願留代表二人在指揮部為質以堅信約」；5月21日，協商達成，傅部改編為龍巖上杭連城三縣邊界保安總隊，傅任隊長，賴子欣為副隊長。¹⁵⁰6月26日，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正式取銷通緝傅柏翠。¹⁵¹至此為止，傅已完全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閩粵贛省委的肅社黨行動，毫無疑問起了為淵驅魚的效果。迄7月底止，中共在整個汀江以東的龍巖、上杭、永定大部分地區，已是眾叛親離。在閩西蘇維埃所在地虎崗北面，傅柏翠的勢力愈加擴大，甚至已打通與龍巖縣城的聯繫，閩粵贛省委「已不能封鎖他了」；在杭武縣東部，雖然坑口事變已被鎮

¹⁴⁵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MYGSQ:1，頁127。

¹⁴⁶ 〈上杭北區赤匪分化〉，《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5月26日，版2。

¹⁴⁷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四號〉（1931/04/24）、〈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六號〉（1931/05/10），MYGSQ:1，頁120、139。

¹⁴⁸ 〈蔡協民關於福建工作情況報告〉（1931/04/13），FJWJ:7，頁158。

¹⁴⁹ 〈中共閩粵贛特委報告第六號〉（1931/05/10），MYGSQ:1，頁139。

¹⁵⁰ 〈楊逢年收編傅柏翠部〉、〈傅柏翠表示決心四點〉，《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5月30日、民國20年5月31日，版2。

¹⁵¹ 〈省府一零七次會議〉，《福建民國日報》，民國20年6月27日，版2。

壓，但東四、五區（古田、白砂一帶）以及東二區稔田一帶，群眾仍是暴動不斷，甚至還企圖與上杭縣民團羅介人聯手攻打虎崗的後門—杭武縣東三區太拔、塘背一帶（當時被劃為閩粵贛省委直屬第二區）；在永定，由於閩粵贛省委捕殺了該地群眾中甚有威信者，因此部分不滿分子（被指為社黨分子）宣傳這是「外來的人」亂扣留本地「革命的同志」，引起群眾普遍恐慌。¹⁵²明顯的，虎崗的失陷已是指日可待。

8月9日，張貞部在傅柏翠等地方武裝的合作下，攻進了虎崗，隨後又相繼攻占了永定堂堡與龍崗等地，龍巖大池、小池蘇區亦完全淪陷；閩粵贛省委則被迫退出虎崗，逃難途中，又在廬豐、豐稔及藍家渡三地遭遇國軍，打了幾場互有傷亡的仗。當此之時，省委恰好接到蘇區中央局的指示，要閩西黨向汀連發展，以鞏固江西蘇區的後方。¹⁵³10月22日，閩西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移至長汀城辦公。¹⁵⁴整個汀江以東的巖、杭、永三縣地區，即非完全淪陷，也已淪為游擊區及白區的地位。直到1932年4月，在以紅一軍團及紅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東進漳州後，閩西蘇區（當時已成立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取代閩西蘇維埃政府）才再度擴展至汀江以東的巖、杭、永三縣。

陸、結 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肅社黨事件的爆發，並非僅僅是肇因於鄧發等少數蘇區黨領導的個人因素，也不完全是由於上層左傾激進路線所致。地方幹

¹⁵²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閩西政治形勢及武裝鬥爭狀況〉（1931/06/24）、〈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六月份的工作總報告〉（1931/07/15）、〈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四號〉（1931/08/20），*MYGSQ*:1，頁214、227、231、236-237。

¹⁵³ 〈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五號〉（1931/08/25）、〈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六號〉（1931/08/30）、〈中央巡視員余澤鴻自閩粵贛蘇區給中央的信〉（1931/08/31），*MYGSQ*:1，頁271-275、278-279。

¹⁵⁴ 〈閩西蘇維埃政府通知第一〇六號〉（1931/10/22），*FJWJ*:15，頁196。

部間長期以來的衝突、外來幹部與地方幹部間的磨擦、黨員與非黨員間曖昧的私人關係，以及群眾的保守心態等等諸多因素，皆是我們在討論肅社黨事件爆發的因素時，所不能不考慮者。

以傅柏翠為例。傅原是一位三民主義的信徒，在接觸了社會主義的信仰後，從事社會改革，打擊地方豪強，並與共產黨接近，以致國共分裂後被視為親共分子遭到驅逐，並於1928年蛟洋暴動後走上共產革命之路。不過，傅始終不贊同共產黨激進的作法，不願為「革命」之故而犧牲自身與地方群眾的利益，甚至公然抗拒上層的指示，因此引起黨內同僚的不滿，於1929年底解甲歸田。但是，傅並未從此成為一位圈外人，在隱居鄉里期間，中共閩西政權既不可能視傅為無物，傅也時常對中共政權進行批評。伴隨著中共路線的愈加激進，以及國民黨圍剿的深入，中共決定採取「高壓」的手段來對付如傅柏翠般桀驁不馴的地方幹部，終於迫使傅與中共全面決裂，走上了「反革命」之路。由此看來，傅所以被視為社黨頭目予以整肅，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同樣的，其他涉入肅社黨事件的黨員，他們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早年的經歷，皆有某種聯繫。如作為被害者的林梅汀，在太平里暴動時便如傅柏翠般對上層暴動指示動搖，因此遭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加上其與傅柏翠及叛黨分子陳祖康的關係，故林梅汀日後被視為社黨分子而遭殺害，並不令人意外。至於林一株、郭滴人、張鼎丞，與傅柏翠比較下，則是較忠實於上層指示的幹部，其後屢受上層重用（如1930年7月後，郭、張分別取代鄧子恢閩西特委書記與蘇維埃政府主席之職務）。由此看來，這些人日後成為肅社黨事件的忠實打手，便不能僅僅說是屈從於鄧發個人狂熱因素的緣故。

至於備受日後學者所指責的鄧發，毫無疑問的確實對肅社黨事件的爆發責無旁貸。然而，我們在評價鄧發的歷史功過時，並不能完全將其行為歸諸於工人階級的出身或狂熱的性格，還必須考慮到當時閩西蘇區受到國軍圍剿此一背景因素。蓋在愈加嚴苛的圍剿下，鄧發不得不採取更加嚴苛的組織紀律等「非常手段」，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然而，中共對閩西蘇區的控制 in 當時仍不甚穩固，鄧發也不如其他蘇區領導般（如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背後有強大的

軍事力量支持其肅反，¹⁵⁵以致伴隨著肅社黨事件的發動與擴大，蘇區內部的反水事件也日益增多，閩西蘇維埃政權愈加無力抵抗國軍之圍剿，最後不得不撤離虎崗。

最後，讓我們簡單地來談談朱毛所領導的紅四軍與此一時期閩西蘇區發展的關係。大多數史家在論及此一問題時，多強調閩西領導鄧子恢與張鼎丞在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影響下，採行實事求是的策略，反對李立三等人不切實際的左傾路線。如Gregor Benton便認為：「閩西領導是“地方實務派”(local pragmatists)的最佳寫照。」¹⁵⁶似此類說法，雖非完全錯誤，但未免過於誇大了毛澤東對此時閩西蘇區發展的影響。不能否認的，鄧子恢等閩西領導的某些行動（如反對出擊東江），確實與策略或戰略的考量不無關係（但是否是受毛的影響，還有待研究），但我們也不應忽略了所謂「保守」的農民意識或地方心態影響了他們對情勢的判斷，甚至限制了他們所能採行的策略。至於朱毛紅軍，他們確實在某些地方表現了較多「地方實務派」的性格；然而，在某些時候，他們也會與外來的左傾分子聯手，共同打擊那些桀驁不馴的地方幹部。由此看來，朱毛紅軍與閩西蘇區的關係，是不能以所謂地方實務派一概而論的。

當然，導致肅社黨事件爆發的因素相當複雜，加上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不可能對其他涉入肅社黨事件的人事物詳加論述，這是本文的局限性。然而，儘管如此，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仍不得不下結論說，1931年爆發於閩西蘇區的肅社黨事件，與同一時期其他中共根據地內部的肅反事件相同，並不僅僅是根源於少數個人或當時中共上層路線的「突發事件」而已，諸多深遠及複雜的因素，促成了此一事件的爆發。我們只有把此一事件放入地方史的脈絡中重新予以探討，才能夠找出其背後深遠及複雜的因素。

¹⁵⁵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頁407-414。

¹⁵⁶ Gregor Benton,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131.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法務部調查局共黨研究中心典藏資料（簡稱調查局資料）

052.1/7422/15556 v.1 n.1，正之：〈第三黨內幕〉，《列寧青年》，1卷1期。

052.1/809/15497 N.25，盧哇利：〈打倒社會民主黨〉（1931/09/10），《紅旗週報》，第25期。

245.2/804/13798，〈中央通知第二一六號〉（1931/03/31）。

255.31/7135/58559，〈福建省委第五次執委擴大會議紀錄〉（1931/02/27）。

255.31/813/9300，〈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

255.35/813/11989，〈福建省委致閩西行委函〉（1930/10/01）。

255.35/813/11990，〈致閩西指示函〉（1930/10/07）。

255.35/813/9227，〈閩西特委來信〉。

255.35/813/9227，〈閩西特委致省委函—關於廿一軍攻永福情形〉（1930/10/16）。

255.35/814/11195，〈檢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930/10/20）。

294.541/2190/11017，〈莆田盧哇利報告〉（1930/11/28）。

湖北省檔案館典藏資料

GM2-1-120（1），鄂豫皖，〈鄂豫皖蘇區三〇、三一年時一些左傾的政策（這材料是根據袁克服等同志談話整理的）〉。

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18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3-1985年。簡稱FJWJ:1-18。

中央檔案館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1931年）》。出版地不

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簡稱MYGSQ:1。

江西省檔案館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簡稱JIGMGJD:1-2。

福建省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閩粵贛邊區革命歷史檔案彙編（1930.12-1935.12）》。出版地不詳：檔案出版社，1987年。簡稱MYGBQ:1。

(二)辭典、工具書

陳立明等編，《中共蘇區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三)報紙

《福建民國日報》，民國18年至民國20年。

(四)專書

上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共永定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永定人民革命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

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閩西革命根據地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

王健英，《中國紅軍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永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永定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林天乙主編，《中共閩粵贛邊區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

武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武平縣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年。

胡師杜，《長汀匪亂史》。臺中：撰者，1973年。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

黃奕明，〈羅明〉，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8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Benton, Gregor,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Esherick, Joseph and Rankin, Mary 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五) 期刊論文

陳祖康，〈青燈夜雨憶前塵（一）〉，《中外雜誌》，20卷1期（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65年7月）。

陳祖康，〈怒潮澎湃話黃埔〉，《中外雜誌》，20卷3期（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65年9月）。

陳復才，〈北四區蛟洋暴動〉，《上杭文史資料》，第2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2年）。

陳耀煌，〈菁英與群眾：北伐前後閩西地區的國共合作與農民暴動〉，《新史學》，14卷1期（臺北：新史學雜誌社，2003年3月）。

傅柏翠，〈土地革命時期上杭北四區農民武裝鬥爭〉，《福建文史資料》，第

7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傅柒生，〈閩西傅氏源流考（上）〉，《臺灣源流》，第22期（2002年夏）。

鄧子恢、張鼎丞：〈閩西暴動與紅十二軍〉，《福建黨史資料》，第3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

盧秀啓，〈九十老翁重入黨—記傅柏翠的坎坷道路〉，《人物》，1990年第2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

羅明，〈羅明同志談福建建黨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福建黨史資料》，第3輯（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4年）。

Averill, Stephen C., "The Origins of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